



Party – states And Their  
Legacies in Post – com-  
munist Transformation

[匈] 玛丽亚·乔纳蒂 / 著  
赖海榕 / 译



# 转型： 透视匈牙利 政党-国家体制

乔纳蒂的这项伟大的实证研究既解释了政党-国家体制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长期而多变的生命，又解释了它在这些国家的突然死亡。而且其中关于普遍性的分析将有助于了解中国的体制及其运行与匈牙利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对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所借鉴。

吉林人民出版社

**Party – states And Their  
Legacies in Post – com-  
munist Transformation**

[匈] 玛丽亚·乔纳蒂 / 著  
赖海榕 / 译

**转型：**

---

**透视匈牙利  
政党-国家体制**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匈)乔纳蒂著;  
赖海榕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4

I. 透… II. ①乔…②赖… III. 体制改革—研究—匈牙利 IV. D7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242 号

Party - states and their legacies in  
Post - 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by Maria Csanádi  
本书由 Edward Elgar 1997 年版翻译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 - 2000 - 434

## 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

---

|      |            |      |     |
|------|------------|------|-----|
| 著 者  | [匈]玛丽亚·乔纳蒂 |      |     |
| 译 者  | 赖海榕        | 封面设计 | 翁立涛 |
| 责任编辑 | 潘丽丽        | 责任校对 | 晓 伶 |

---

|       |                                                   |
|-------|---------------------------------------------------|
| 出 版 者 |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br>(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
| 发 行 者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 制 版   |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
| 印 刷 者 | 长春市华艺印刷厂                                          |

---

|      |                                |     |           |
|------|--------------------------------|-----|-----------|
| 开 本  | 850 × 1168 1/32                | 印 张 | 13.125    |
| 版 次  |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     |           |
| 印 次  |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
| 字 数  | 270 千字                         | 印 数 | 1—5 000 册 |
| 标准书号 | ISBN 7 - 206 - 03947 - 2/D·995 |     |           |
| 定 价  | 24.00 元                        |     |           |

---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 中文序

本书的匈牙利文版出版于1995年。到那时为止，匈牙利已经部分地完成了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转型。本书将向中国读者指出导致匈牙利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转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笔者希望，其中分析的普遍性将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中国的体制及其运行与匈牙利的体制及其运行之间的相似之处。有证据表明，尽管两国的面积、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制度发展水平等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两国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至于有关匈牙利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分析，它将有助于澄清特殊运行和转型的结构背景。我还希望，本书使用的方法可以用来深入分析中国转型过程的结构特性。

本书的最后一段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而不是像东欧和苏联那样发生衰退、解体和崩溃。从那以后，我的兴趣就转向了中国的转型过程，我开始寻找导致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东欧和苏联发展道路的结构因素，也开始寻找导致东欧和苏联各国发展道路出现差异的结构性因素。

本书和我的进一步研究都表明，我关于改革在体制的动态运行中的作用的观点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体制里，各种工具是用来给体制的自我再生产提供资源的。具体使用什么工具取决于具体体制的结构特性。也就是说，改革是结构限定的工具，目的是取得体制的自我再生产所需的资源。在资源抽取方面不存在结构约束的社会主义体制里，改革是不会发生的。不

仅如此，在经常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体制里，改革与这些体制里可用资源是否构成约束是交替出现的。如果还有资源可供使用，改革就不会发生；如果体制内的可用资源发生匮乏，新的改革就会得到推动。因此，社会主义体制里的改革是这些体制动态运行的内在产物。改革的加速前进不是什么“改革派战胜保守派”的简单问题，而是体制本身需要更多资源的内在的结构性动力推动的。

因此，一方面，旨在遏止改革的紧缩只会减缓转型的进程，而不会遏制住转型的进程，因为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在改革必然要进行的地方，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战略，其操作的空间也是受结构的特性制约的。改革出现的位置（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改革的速度（是休克疗法还是渐进式改革），改革的顺序（是先经济后政治还是先政治后经济），以及进行这些改革的整体制度状况都取决于具体结构的特性，而不取决于所作出的战略选择。

虽然发生转型的体制背景非常不同，但中国和东欧的转型本身展现了很多相似的特征。转型发生在不确定性累积的背景下，因为这个时期发生的变迁在质和量上都不是一个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不是先后发生的，而是同时发生的；不是在一些个人或较小的群体上发生，而是在巨大的社会阶层的规模上发生的。累积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旧的制度、程序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功能突然消失，而新的制度、程序和社会基础设施却发展缓慢，这也导致了社会的紧张状态。国有部门内外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经济动态进程的差异加大，也导致了社会紧张状态的加剧。累积的不确定性、紧张状态和替代的选择加快了摆脱僵化的国家结构的过程，加快了甩掉一度强大的权力身上日益增长的负担的过程。越来越多能干

的专业人士出走，较有活力的经济单位自立门户，不盈利的单位和多余的人力资源受到裁减，亏损单位被关门或出售，政府权力下放，对各种责任进行再分配，等等，都是这个过程的表现。

累积的不确定性、流动的制度背景以及紧张状态的加剧都迫使经济行为人采取短期的行为，而且也经济行为人的短期行为提供了机会。短期获利的机会鼓励了寻租行为：增加不法获利、隐瞒收入、逃税、洗钱、腐败、把利润消费掉而不是用来再投资、把国有部门的利润转移到私人部门、滥用国家资产、贩卖毒品以及掠夺环境资源（引进或继续使用过时的污染环境的技术、毁坏森林、排放有害的废物，等等）。不仅如此，短期行为还激活了非正式的或非法的联系，它将鼓励决策者越过合法的或制度化的渠道，从而形成了复杂的黑市网络。

因此，一方面，短期行为的动机起到了重振经济和促进重组过程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们又制约了重振经济的可能性。这些都是转型的普遍特征。不过，不同的结构特性对转型造成的不同影响使得短期行为的强度在各地的表现有所不同。

试图遏止转型过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也将是非常短暂的努力，它只会增加经济和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主张市场就是一切，让市场放任自流，而无视它的负面后果（其中既有与转型有关的又有与转型无关的负面后果），也会造成要付出社会和经济代价的局面。如果不对转型的动态过程加以控制，转型的加速会无法驾驭。相反，力图控制和弥补转型的负面影响看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战略：在即定结构的约束下，社会与经济成本会降低，紧张状态将得到缓解，累积的不确定性的时期将缩短，由长期战略主导的经济重组的范围将扩大。

不过，要实行有效的长期战略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国家的职能必须加以重组，决策过程应该有社会的参与，从而能够分担相应的责任，使得转型能够受到公众的控制并使转型得到更大的社会支持。这也要求热心的改革者认识到，关心转型过程后果的人并不一定是想要遏止转型的人。

中国的各方面人士都在作出巨大的努力去实施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经济政策。更具体地说，长期战略就是减少累积的不确定性、从而减轻短期行为的影响和缩小短期行为作用范围的战略。长期战略主要是创立和实施法治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能够长期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而且能够同时控制短期获利型投资行为的活动范围，从而逐渐减少这种行为。

大型社会基础设施和再培训中心的建立缓解了社会紧张状态，弥补了自下而上加速扩展的国有企业的清盘、重组和出售带来的失业增加的后果。同样重要的是弥补地区之间的差异，即，对内部省份进行基础建设投资，并给予它们特殊的优惠政策，以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在建设和吸引现代技术方面也为它们提供强大的激励。

官僚体系在行使长期职能的同时，本身也是转型的普遍特征的一部分。因此，可以从中看到重要过程的萌芽：制度创新、差额选举和竞争性的选举在基层发展起来。这些过程将逐渐增加制度上和程序上的透明度。它们从长期来看是再分配了责任，增加了公众所能得到的信息，扩大了开放程度，增强了社会意识和社会活动，提升了公众对决策的控制。

最后，本书是一本严格的科学研究作品。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只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本书没有提出任何的处方。本书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匈牙利社会主义体制的结构和动态运行。探讨转型本身的部分是书中最短的部分，而且自本书（匈牙利版）出版以来转型本身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书中的有关探讨基

## 中文序

---

本上是理论性的，因为1989年到1994年这段时间太短，无法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我的分析，我并且希望，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分析是有说服力的，是有益的。

我非常感谢赖海榕先生的翻译工作，他对本书的思想理解得很准确，并且富有工作的热诚，是我能找到的最理想的译者。我非常感谢柳红女士，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是一项跨大陆的合作，为了克服其中的许多困难，她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期间，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我要向吉林人民出版社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为这部学术书籍的中文版的出版提供了机会。

玛丽亚·乔纳蒂

2001年12月



## 原版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分裂为两个板块：东方与西方。这个分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欧洲历史上长期分裂的延续，那是栖息近代国家的地区与由帝国统治的地区之间的分裂，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分裂，是工具主义文化与超验文化的分裂，进一步回顾中世纪时期，则是系统崩溃与团结之间的分裂。然而，欧洲最近分裂的惊人之处是它的全面性。东方不只是在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孤立于西方，或者各自成为对立集团的成员，而且西方与东方的体制是建立在彼此针锋相对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对西方来说，战后秩序的基石是经济与政治竞争。对东方来说，垄断——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垄断，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石。这个根本上的不同产生了一系列鲜明的对比：例如，市场与计划的对比；一个参与而大体上是温和的国家与一个干预主义的、暴虐的国家之间的对比；更多的社会不平等与较少的社会不平等的对比；只是存在环境问题与发生环境灾害之间的对比；持续的、惊人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表现忽好忽坏之间的对比。同样惊人的战后分裂的时间是这么长。从雅尔塔会议到团结工会与波兰政府举行圆桌会议，中间经过了45年的光阴。

自然，关于两个欧洲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强调核武器、两极对立、围堵以及后来的缓和是“长期和平”后面的推动力。同时，研究民主发展的学者或注重东部欧洲或注重西部欧洲，他们深入研究

两个地区战后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背后的根源。事实上，所有这些研究都暗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体制（无论在本国的层次上还是在区域的层次上）能够长期存在是有深刻原因的。虽然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警告——特别是政治反对派、经济无效率、社会矛盾以及更普遍的意识形态停滞、政治停滞和经济停滞等问题，但是结论仍是：太多的压力，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压力，都在维持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不是在破坏它的方向上起作用。甚至那些右翼的评论家在证明国家社会主义令人厌恶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力量，以及它的持久性，他们不断呼吁西方要保持持续的政治与军事警惕性。

如果1989年是分裂的欧洲与统一的欧洲之间的巨大分界，那么这一年也是区分欧洲学术研究的一个巨大分界。在过去的40多年里，学者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提出了无数的观点，以支持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逻辑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逻辑，以及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逻辑，但是，1989年以后，东西方学者研究的问题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在国家社会主义崩溃的最初几年，战后秩序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成为一系列研究的焦点，战后秩序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持久性没有多少人研究。特别是对国家社会主义来说，主要的观点从该体制的理性特征和自我维持特征迅速转到了它的非理性和自我毁灭趋势上。当时的任务当然是解释1989—1991年的发展；换句话说，解释共产主义制度在整个地区的崩溃、苏联集团的崩溃、战后秩序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这些研究——学者们有时不得不尴尬地承认没能预见到这个剧烈的变化——造成了下面这种研究的蓬勃发展：它们集中探讨后来称为自由民主的各个方面，探讨欧盟、北约和其他

多边组织向东的扩展。这些研究中许多研究都隐含着三个没有言明的假设：国家社会主义已经“结束并成为历史”；这些国家的现在和将来而非过去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理解这个地区的关键是把过渡理论（在别的时代和别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与可以称为“问题的解决和制度的建立”的实践结合起来。

我在这里对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亡以及随后的转型的学术研究进行了简要的评论，旨在提醒我们，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和解释看来严重依赖于事件的发展进程。因此，像民主政体里的许多政治家一样，像资本主义经济里的许多生产者 and 消费者一样，社会科学家看来也是非常短视的。更直率地说，就是，潮流而非本质、革命而非演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研究的主题——以及我们研究的方法。但是其中还有另一个教训：认为体制具有可持续性的分析与指出了它的根本缺陷和可悲之处的分析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因此，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解释体制的长期发展和它的突然崩溃？我们怎样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长命和它的突然死亡？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把国家社会主义本身长期以来发生的许多变化也考虑进去的答案？简言之，我们怎样才能把它的演进性与它的突变性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这个体制，不可能理解它的运行和它的运转失灵，我们就不可能对为什么它长期存在和它为什么结束的问题给出坚实的回答。反之，则我们将有一系列良好的框架，能够在给定的点上捕捉住一些强势和一些弱点，一些制度上的细节，以及一些新的发展。

玛丽亚·乔纳蒂在这本书里研究的正是这些有待回答的问题——关于体制的结构与其运行之间的关系以及体制的演进与

其崩溃之间的关系的的问题。该书的分析涵盖了将近 40 年的事件，从 1956 末开始到 90 年代初结束。它建立在一个貌似简单的核心上：体制的运行及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变化反映了党和国家机器的结构及其运行原则。她在这里强调了这部机器一系列鲜明特征的重要性：例如，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强大渗透；党对人事任命的权力以及确保党控制政治和经济的其他机制；党内的个体与国家内的个体之间严格的双边联系和依附纽带；整个结构里的决策者的原子化（这对联盟的形成和集权的控制产生了重大的后果）；作为一个整体的体制的同构结构（同构意味着，无论时间、空间、深度和政党—国家结构所处的条件有何不同，这些结构的要素、体制的主要连结原则和运行原则具有自我相似性）。这些特征和其他特征产生的结果是冲突、极其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对经济和政治资源无尽的饥渴。然后是改革的压力，改革的实际结果是促使现存结构更加精致，饥渴进一步发展并进一步产生改革的压力。当体制实际上筋疲力尽时它就崩溃了。因此，体制在短期内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长期内它是自我毁灭的。它造就了增长，但随后又破坏了增长；它创造了权力然后又打碎这些权力。而且，正是增长与权力——也就是经济与政治资源的扩张——驱动着体制前进，并且正是二者的矛盾导致了它的垮台。

因此，乔纳蒂在这里阐述的是我们没有进行过的论证，它给国家社会主义的两个故事塔起了桥梁：她的论证既解释了这个政治经济体的长期而多变的生命又解释了它的突然死亡。这个论证本身就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如此，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本书的其他几个重要方面，我们将更强烈地感到它是一部非凡之作。首先，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该书的分析吸取了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应用了生物学、

人类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如此，虽然许多分析家极力思索国家社会主义里政治与经济的紧密联系问题，但是对这种联系的一般理解是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或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而乔纳蒂把这两个领域看作是互相融合的。她所做的是避免本领域问题专家的普通做法——他们要么认为政治是在经济理性和经济效率的逻辑中运行的（经济学家），要么认为经济是用来实现政治权力的手段（政治学家）。相反，她用经济—政治连为一体的逻辑来界定这个体制。

指出她的目的是界定一个体制也是很重要的。不必说，她并不是第一个谈论体制的社会科学家。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分析家来说，使用体制这个词时并没有对其进行严加思考，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责任对体制本身的具体特征进行界定。简言之，体制几乎是条件反射地跟在形容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后面的名词。它成了一个方便的隐喻，使得我们可以迅速地跳到手头的实际问题上。但是，对乔纳蒂来说，这个名字本身非常重要。它引导她仔细考察制度细节，考察人民与职位的联系，考察生产与资源的流动，考察决定关系的规则，考察制度的使命和他们与政策的关系，考察结构的边界，考察结构与其运行及其再生产之间的联系。因此，这本书的论题是异常雄心勃勃的。这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它完全不是谈笑风声式的解说，而是深入制度细节的苦心孤诣的分析。

最后，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作者毕生工作的成果。乔纳蒂从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试图理解体制内的某些发展。这使她着手研究体制的某些方面，它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新的研究课题，发现新的角落和缝隙需要加以研究。在接下来的15年里，在追索各种政治与经济连线的过程中，她为政党—国家的结构和运行描绘了一幅完整和精致的图画——甚至可

以称它是一幅刺绣。

然而，重要的不仅是她持久的好奇心和耐心，重要的还在于她对经验细节的关注。这项研究远比我们所做的其他一切研究更加依赖于大量的数据，其中不仅包括东欧学者和西方学者关于企业内、国家内和党组织内决策的全部研究，而且包括对党和国家机器内的备忘录与党和国家的未公开文件的研究。此外，她还有一个我们谁也无法效仿的数据来源，即，在过去的20年里长期持续地进行大量访谈，访谈的对象遍及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的党、国家和经济单位，人数多达400人。这些访谈给作者提供了很多启发——作者不仅从有关官员的观感中得到启发，而且还通过他们提供的文件、他们在电话交谈中透露的信息、他们与同事的交流以及他们的任免日程上看到问题的本质。

因此，我们从乔纳蒂的书中看到的不是对体制进行回忆的粗线条概括，而是由强有力的理论组织起来的，对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体制内日常生活的众多细节所作的总概括。因此，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体制的日记。像大多数的日记一样，它有着两个重要的特性：第一，其记忆是久远的；第二，为了与后来的发展相一致而重新改写故事的可能性非常小。不过，不同于大多数日记的是，这个日记是由作为外部人的一个社会学家写的。从事这项工作，乔纳蒂非常适合，因为她是一个由大量的信息、丰富的经验和明确的目标（清晰地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以及它在其存在的最后30到40年里的运行）武装起来的、富有洞察力的观察家。

瓦蕾丽·邦斯

——美国斯拉夫研究协会主席 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



**玛丽亚·乔纳蒂 1946 年 11 月 20 日出生**，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毕业于布达佩斯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1978 年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有：政党－国家体制中经济与政治决策制定的相互依赖性、不同的政党－国家体制之间的结构性相似与差异、匈牙利新政权结构的发展与制度化，以及对东欧和中国关于此课题的比较研究。主要著作及有影响的论文有：《转型中的不确定：匈牙利的后社会主义》、《起点是什么？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型》、《私有化过程对环境的影响》、《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中政党－国家体制的遗产》、《政党－国家体制中利益实施能力的结构性差异：结构背景下的精英定义》。

## 内容简介

该书客观地描述了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匈牙利社会主义体制的结构、运行、自我消耗以及转型的整个过程，指出了匈牙利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转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本书不仅涵盖了东欧和西方学者关于企业内、国家内和党组织内决策的全部研究，而且包含了对党和国家的备忘录与未公开文件的研究，以及作者本身持续了 20 多年的对 400 多名匈牙利前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进行的访谈。乔纳蒂的这项伟大的实证研究既解释了政党 - 国家体制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长期而多变的生命，又解释了它在这些国家的突然死亡。而且其中关于普遍性的分析将有助于了解中国的体制及其运行与匈牙利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对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所借鉴。



献给我的父母:吉奥尔吉·德米特尔与罗莎·德米特尔  
献给安德拉什  
献给我的孩子们